

朱怡帆, 何丹, 范振杰.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J]. 地理科学, 2023, 43(9): 1598-1607. [Zhu Yifan, He Dan, Fan Zhenji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9): 1598-1607.] doi: 10.13249/j.cnki.sgs.2023.09.010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朱怡帆^{1,2}, 何丹^{1,3}, 范振杰³

(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2.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3.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摘要: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 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 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 ① 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 各变量均需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 ② 7 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 ③ 居民高幸福感存在 4 种作用路径, 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 4 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关键词: 乡村旅游地; 居民幸福感; 人地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2.3/K9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3)09-1598-10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业农村观光度假功能凸显, 中国兴起了以休闲度假为主的乡村旅游活动。乡村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经济一大重要细分市场, 特别是 2020 年以来短途游、乡村游成为替代跨省中长途旅游的主要旅游休闲形式^[1]。乡村旅游因其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同在性”, 为乡村生产要素回流、消费集聚和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提供可能^[2],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3]。作为“幸福产业”之首, 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增加旅游地居民收入, 还凭借其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并存的特质, 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作用, 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旅游业也是供需作用下高度市场化的产业^[4], 旅游体验提升游客幸福感, 旅游地居民在参与旅游活动中同样受到旅游业影响^[5], 这在与地方紧密关联的乡村旅游中尤为突出。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等概念受到旅游地居民感知研究关注, 但居民幸福感的定义尚未统一。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 本文认为幸福感是个人物质满足和精神富裕并存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

其中个人价值感的实现在幸福感获得过程中发挥着与生活满意和积极情绪同样重要的作用^[6]。现有的文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7]、logistic 回归^[8]等定量分析方法和以观察法、访谈法为主的质性分析方法^[9], 探讨了不同类型目的地或居民群体^[7-9]幸福感的测量与评价、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10]、基于目的地居民幸福感分析引致结果及其作用机理^[11]这 3 类问题。旅游地作为人地密切关联的复杂巨系统, 居于主导地位“人”的幸福感则会受到客观物质环境与主观社会关系变迁的多重影响^[12], “人-地”与“人-人”互动关系在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推动作用。有研究表明客观物质层面的经济状况与环境质量^[9,13]以及个体感知层面的社会责任^[14]、社区满意与社区认同^[15]等因素对居民产生影响, 继而溢出影响了其生活领域满意度与幸福感^[16]。然而, 目前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分析侧重于线性关系刻画, 对影响因素间相互依赖关系及其具体作用路径的研究较为缺乏。

立足于人地关系视角, 本文试图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首先构建基

收稿日期: 2022-10-02; 修订日期: 2023-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49)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3ZDA049).]

作者简介: 朱怡帆(2000—), 女, 四川德阳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旅游地理学。E-mail: chyifanz2000@163.com

通信作者: 何丹。E-mail: dhe@re.ecnu.edu.cn

于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社会文化因素的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框架,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验证各变量对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作用的净效应,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探究实现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与路径类型,以期为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提供方法支撑,深化对旅游改善乡村居民物质、精神生活作用过程的认识。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框架与假设

本文依托“人-地”关系与“人-人”关系搭建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分析框架,从“人-地”关系角度分析乡村旅游地经济、设施等硬环境变化对居民幸福感知的影响,从“人-人”关系角度分析旅游地社会文化、社区参与等软环境变化对居民幸福感知的影响。考虑到居民幸福感与感知主体内部特征的关联,将反映居民自身发展与主客关系的指标纳入模型。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构建影响因素模型,以溢出理论解释影响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关注外部环境变迁与居民内部情况,依托整体的系统观念对人地相互作用下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与路径进行分析,丰富现有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研究。

居民对旅游带来的经济与环境影响的感知表征了旅游影响中涉及“人-地”客观物质环境互动的部分。收入增加、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乡村旅游地提升旅游吸引力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17]。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社区参与则涉及到“人-人”社会人文互动的部分,为旅游业发展服务的系列文化活动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18],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文化认同,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过程在使居民广泛获益的同时也能够唤醒居民权利意识,引导目的地社区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人”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主导因素,主客互动被认为是旅游中人地关系的独特一环^[19]。情感团结变量能够衡量特定情况下个人或群体之间的情感认同^[20],适用于衡量旅游活动中居民与游客间的关系质量。旅游地主客关系的好坏在居民感知旅游影响和对待旅游开发的态度中发挥着决定作用^[20]。在参与旅游发展与管理等涉及利益分配的决策中,居民不仅从经济和环境等方面获益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还通过与社区成员及游客情感互动或知识分享

来增强社区归属感,提升自我发展技能^[21],进而提升幸福感。

已有研究论证了上述要素在居民幸福感获得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单一要素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简单的线性方法无法将复杂系统中变量间相互作用纳入考虑。复杂性理论指出验证前因变量(antecedent condition)可能是必要的,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很少能完全预测高值或低值的结果变量(outcome condition)^[22]。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要素的存在能够完全使得高值结果变量成立。因此提出假设一(H1):单个要素不能完全预测乡村旅游地居民的高水平幸福感。

在 H1 假设基础上,多个要素的组合能够对高值结果变量存在与否发挥决定作用。一个具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简单条件的复杂先行条件足以预测一个高值结果变量^[22]。多要素组合分析不仅能够解释不同要素对高值结果的影响,还能反映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依赖关系,对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进行全面反映。已有研究利用要素组合思维系统分析不同情境下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感知^[23]。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二(H2):要素组合对乡村旅游地居民获得高水平幸福感存在影响。

分析影响高值结果变量的要素组合是探究要素对结果变量作用路径的核心步骤,而对于数量较多、表现复杂、特征不明确的要素组合,需要对其进行归纳演绎,挖掘要素组合共性,得出具有一般性参考意义的模式或路径^[24]。已有研究通过环境抗争^[25]、邻避冲突^[26]引致要素的组合研究,归纳出作用路径类型。因此提出假设三(H3):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高水平幸福感的要素组合间存在共性使其能够归纳为特定模式。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 PLS-SEM 与 fsQCA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27]。采用 PLS-SEM 方法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模型与假设进行验证,计算模型中各变量对幸福感影响作用的净效应。由于 PLS-SEM 方法无法回答变量间交互作用如何影响结果的复杂因果关系^[27],进一步采用 fsQCA 分析引致居民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并对作用路径进行分类,从而探究诸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复杂作用机制。

fsQCA 是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中的一种,通过构建模糊集数据揭示前因变量与结果间非对称的复杂因果关系^[27],近年来逐渐在管理学领域得到

运用。fsQCA 以简单解、中间解与复杂解的形式呈现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基于一致性(consistency)与覆盖率(coverage)2个参数对结果的隶属度和解释力进行判断。一致性与覆盖率取值范围为(0,1),当一致性水平大于 0.75 时可以接受,越接近 1 解释水平越高^[28],对覆盖率的判断标准没有明确限制,普遍以一致性数值为覆盖率 3 倍作为判断依据^[23]。

1.3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1) 问卷设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变量均参考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进行测度以保证结果的有效性,并针对现实情况进行微调,共涉及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社区参与、情感团结、自我发展、幸福感 7 个维度题项。此外还收集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以及收入水平 5 个信息。

2)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绵竹市年画村、年俗村村民的问卷。年画村与年俗村均位于四川省绵竹市南大门核心位置,形成了绵竹年画传承体验与餐饮接待两大产业重点,拥有较为完善的乡村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其中年画村 2010 年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9 年 7 月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年俗村 2019 年被评为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2 村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早、持续时间久、发展成熟,是成都平原的典型旅游乡村,在国内旅游乡村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2022 年 1 月进行 20 份问卷的预调研,随后对题项中表意不明的部分进行调整。正式调研时间选择在横跨春节假期前后的 2022 年 2 月,游客量呈现较为明显的淡旺季特征。问卷采用面对面方式填写,村民理解困难的问题给予及时解释。2 村共发放 14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26 份,有效率为 90%。300 份以下中小规模的问卷数量以及一对一发放保证了数据可靠性,也适合于介于单个案例定性分析与大样本定量分析之间的 QCA^[28]。

被调查者中男性占比 45.2%,女性占比 54.8%;46 岁以上占比达 55.6%,35 岁及以下人群占比 16.6%;75.4% 的被调查者接受初中及以下程度教育,仅 9.5% 接受大学或大专教育;收入部分或完全来自旅游业的被调查者占比 48.5%;平均月收入在 3 000 元及以下的占比 46.7%,4 000 元及以上的占比 35%。整体来看,被调查者涵盖了各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与收入水平的村民,具有较强随机性,确保了数据的代表性与可靠性。

2 数据分析与结果

2.1 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

研究首先运用 SPSS 23.0 与 SmartPLS 3.0 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通过 Cronbach's α 值检验变量信度,结果显示 7 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6,高于 0.7,说明问卷数据具有比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分析中,先采用 KMO(Kaiser-Meyer-Olkin)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对数据进行效度检验以判断因子分析的适合度,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73,符合大于 0.7 的要求;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概率 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表明所选变量之间具有足够相关性,适合于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主成分分析中用最大方差旋转法,按照因子载荷大于 0.5 的标准提取因子。结果显示 7 个公因子能够有效识别,累计解释率达到 76.465%,符合大于 60% 的方差贡献率标准,说明提取出该 7 个因子能够被接受(表 1)。

采用 SmartPLS 3.0 软件检验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通过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和平均提取方差(AVE)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结果表明所有观测指标的因子载荷均满足大于 0.5 的判断标准,所有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取值 [0.871, 0.910],CR 分布 [0.904, 0.940],AVE 为 [0.655, 0.840],均大于 0.5。各变量的收敛效度与组合信度均较高。

通过检验 AVE 平方根值判别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区分效度的判别方式为观察 AVE 以及 AVE 平方根与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大小关系,一般来说需要同时满足 AVE 大于 0.500 以及潜变量间相关系数小于 AVE 平方根。将潜变量间相关系数与对角线加粗的 AVE 平方根数值进行对比,对角线下数值均小于对角线数值。各潜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较好(表 2)。

2.2 PLS-SEM 分析

采用 PLS 方法得出结构模型的分析结果,通过路径系数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情感团结($\beta=0.403$, $t=4.524$, $P<0.001$)、环境获益感知($\beta=0.231$, $t=2.765$, $P<0.01$)与社会文化获益感知($\beta=0.228$, $t=3.019$, $P<0.01$)分别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自我发展($\beta=0.192$, $t=2.087$, $P<0.05$)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经济获益感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7个变量		
			Cronbach's α	CR	AVE
经济获益感知(EC)	我在本村的收入提高	0.958	0.905	0.934	0.782
	我的家庭收入渠道增加	0.954			
	我从本村获得旅游相关的分红	0.750			
	我的生活水平提高	0.859			
环境获益感知(EV)	本村环境卫生条件改善	0.884	0.910	0.936	0.786
	本村空气、水源等干净	0.871			
	我在本村的居住条件改善	0.907			
	本村基础设施改善	0.884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SC)	本村休闲文化活动变丰富	0.810	0.897	0.924	0.709
	本村传统文化风俗得到保护	0.834			
	村民素质提高	0.813			
	家庭关系变和睦	0.884			
社区参与(CP)	我和旅游管理者(村委会、景区管委会、旅游开发商等)有密切联系	0.879	0.871	0.904	0.655
	我曾参与村里的旅游决策	0.799			
	我曾参与到村里的旅游监督中	0.645			
	我提出的建议能得到旅游相关部门尊重	0.852			
情感团结(ES)	我了解本村旅游发展相关情况	0.850	0.898	0.921	0.661
	我经常与游客进行互动交流	0.816			
	我和一些游客成为了朋友	0.804			
	我喜欢游客	0.822			
自我发展(SD)	我理解游客	0.828	0.894	0.934	0.824
	我感受到本村从接待游客中获益	0.785			
	我感谢游客为本村旅游与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0.823			
	我在本村有更多工作机会	0.904			
幸福感(SWB)	我掌握了更多旅游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	0.914	0.905	0.940	0.840
	我有更高的个人成就感	0.904			
	我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0.927			
	我经常 would 感到开心	0.929			
	我很少感觉难过	0.893			

注: CR为组合信度; AVE为平均提取方差。

表 2 相关分析与效度检验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	EC	EV	SC	CP	ES	SD	SWB
EC	0.884						
EV	0.287	0.887					
SC	0.348	0.533	0.809				
CP	0.543	0.302	0.352	0.813			
ES	0.518	0.406	0.492	0.601	0.908		
SD	0.632	0.372	0.384	0.613	0.648	0.842	
SWB	0.359	0.544	0.571	0.394	0.649	0.533	0.917

注: 对角线加粗数值为AVE平方根值; EC为经济获益感知、EV为环境获益感知、SC为社会文化获益感知、CP为社区参与、ES为情感团结、SD为自我发展、SWB为幸福感。

知 ($\beta=-0.075$, $t=0.745$, $P>0.05$) 与社区参与 ($\beta=-0.076$, $t=0.895$, $P>0.05$) 对居民幸福感均不具显著影响。决定系数 R^2 能够衡量模型中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解释能力, 结果显示 R^2 值为 0.563, 符合大于 0.1 的判断标准, 即该模型解释了居民幸福感 56.3% 的方差。模型解释力较强。

通过预测相关性指标 Q^2 值与 PLS_{predict} 算法^[29] 检验模型预测能力。一般认为 Q^2 大于 0 时该模型与内生潜变量具有预测相关性^[29], 结果显示幸福感的 Q^2 值为 0.451。通过 PLS_{predict} 算法比较基于 PLS-SEM 估计产生的均方根误差 (RMSE) 与线性基准模型 (LM) 产生的均方根误差, 结果显示幸福感下属 3 个测量指标 (SWB1、SWB2、SWB3) 的 Q^2 预测值分别为 0.501、0.386、0.372, 均大于 0; 3 个测量指标基于 PLS 的 RMSE 值分别为 0.481、0.554、0.621, 均低于基于 LM 的 RMSE 值, 分别为 0.499、0.566、0.720。该模型有良好预测能力。

2.3 fsQCA 分析

PLS-SEM 方法仅考虑单一高值前因变量对高值结果变量存在的影响力净效应, 不能完全概括相互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可能会造成对低值前因变量引致高值结果变量情况的忽视^[22]。因此, 需要通过 fsQCA 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复杂因果关系。

构造良好的模糊集是进行 fsQCA 分析的关键步骤。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 由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 3 个锚点构成模糊集标准, 将原始变量值转换为 0~1 的模糊隶属分数。首先将原始变量取平均值, 并对平均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由于问卷填写中可能存在主观性, 不能直接选择 1、3、5 作为上述 3 个锚点, 根据问卷实际情况, 按照 5% 为完全隶属, 50% 为交叉点, 95% 为完全不隶属的标准来确定锚点并对 7 个变量进行校准。

1) 必要条件分析。在进行条件组合分析前, 第一步需要检测各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当单变量相对于结果的一致性分值大于 0.9 即可被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28]。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各条件变量一致性均未超过 0.9, 所有变量均不能作为居民高幸福感结果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 (表 3)。H1 所提出的“单个要素不能完全预测乡村旅游地居民的高水平幸福感”得到证实, 并将多个变量组合分析引致居民高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与机制。

2) 条件组合分析。使用 fsQCA3.0 软件对校准后数值的一致性与覆盖率进行分析。分析过程中为满足 75% 以上的案例覆盖率, 将频数阈值选定为 1, 一致性阈值确定为 0.8。考虑到结果的可读性与适中复杂度, 采用中间解对充分条件组合进行解读, 得到 M1~M7 共 7 种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一般认为当覆盖率大于 0.20、一致性大于 0.75 时模型总体效果较好^[28]。根据中间解结果可知总体覆盖率和一致性均达到较好水平 (表 4)。

在 M1~M7 这 7 种条件组合中, 情感团结的出现频次达到最高的 6 次, 分别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5 次, 边缘条件存在 1 次,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出现频次达到 5 次, 同时没有任何其他条件能够脱离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而形成高幸福感路径; 环境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出现频次同样达到 5 次, 其中作为核心条件存在 4 次, 边缘条件存在 1 次。所有要素都通过与其他要素的组合形成高水平幸福感的预测路径。H2 所假设的“要素组合对乡村旅游地居民获得高水平幸福感存在影响”得到验证。

此外, 经济获益感知、社区参与以及自我发展 3 个变量在 7 个条件组合中呈现“存在”“不存在”或“可以存在可以不存在”的不同方向, 说明 3 个变量在预测居民高幸福感的模型中更易受到其他因素

表 3 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经济获益感知	0.6962	0.7568	~经济获益感知	0.5227	0.5825
环境获益感知	0.8368	0.8026	~环境获益感知	0.4060	0.5243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0.8291	0.7981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0.4332	0.5565
社区参与感知	0.6751	0.7834	~社区参与感知	0.5789	0.6059
主客关系感知	0.7351	0.8492	~主客关系感知	0.5125	0.5386
自我发展感知	0.7506	0.8186	~自我发展感知	0.5075	0.5637

注: “~”符号意为“非”, 表示该条件的非集。

表 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 of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高幸福感条件组合						
	M1	M2	M3	M4	M5	M6	M7
经济获益感知	⊗	-	•	⊗	⊗	•	●
环境获益感知	-	●	-	●	•	●	●
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	●	●	-	•	●	-
社区参与	⊗	⊗	-	⊗	-	•	●
情感团结	●	●	●	●	•	-	●
自我发展	-	-	●	⊗	⊗	●	•
原始覆盖率	0.3062	0.3473	0.5099	0.2721	0.2679	0.4662	0.4616
唯一覆盖率	0.0075	0.0017	0.0270	0.0150	0.0050	0.0304	0.0177
一致性	0.9470	0.9301	0.9310	0.9516	0.9299	0.9341	0.9409
总体覆盖率				0.664936			
总体一致性				0.912701			

注: ●和•表示该条件存在; ⊗和⊗表示该条件不存在; ●和⊗为核心条件; •和⊗为辅助条件; -表示该条件可以存在或者不存在。

影响。当经济获益感知与社区参与、自我发展在条件组合中同时出现时方向一致,表明三者间存在一定依赖性,7种条件组合中唯一覆盖率最高的M6显示经济获益感知越强烈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对自我发展的感知也更高,由此引致高幸福感。自我发展在7种条件组合中共出现5次,且均与经济获益感知伴生出现,在组合中呈现相同方向,也说明了自我发展感知与经济获益感知间表现出最明显的变量间相互依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获益感知较弱的居民无法获得高幸福感,M1、M4与M5显示通过分别与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和社会文化获益感知3个变量组合,“~经济获益感知”也能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即尽管部分村民无法从乡村旅游开发中直接获得经济效益,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善、主客情感团结、文化活动丰富等依然能够使该

部分居民享受到旅游开发的溢出效应,从而获得高水平幸福感。由此可见经济获益感知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是复杂的,经济获益感知与高幸福感之间的单向假设无法得到证实。

最后,社区参与在7种条件组合中存在次数最少,仅2次作为存在条件出现,3次作为不存在条件出现,再次证明当前乡村旅游地中社区参与对居民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旅游开发居民自主性意识与能力的欠缺有关。

2.4 路径类型

在图1中,基于fsQCA结果对条件组合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7种条件组合构成了共4种类型的高幸福感作用路径,分别为纯关系型、经济-关系型、环境-关系型与经济-环境-关系型。4种类型的作用路径均体现出旅游情境下人与地方、人际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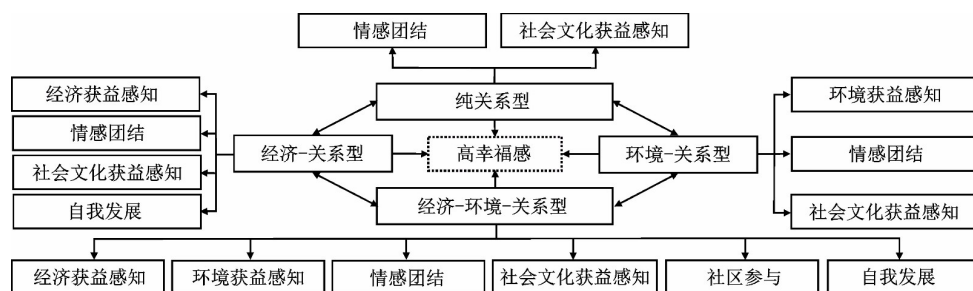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作用路径

Fig.1 Affecting paths of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相互作用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H3 所提出的“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高水平幸福感的要素组合间存在共性使其能够归纳为特定模式”得到证实。

4 种类型均涉及和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相关的关系要素, 其中“纯关系型”包含 M1 这一条件组合, 通过 2 类主客与人际关系变量作为核心存在条件达到高幸福感; “经济-关系型”包含 M3 条件组合, 在 2 类关系变量基础上辅以经济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 达到比纯关系型条件组合更高的唯一覆盖度, 说明在获得良好主客与人际关系之外, 通过经济参与以及自我发展会增加居民高幸福感情况的发生。

包含条件组合数量最多的为“环境-关系型”路径, 包括 M2、M4、M5 等 3 种条件组合, 均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为主要存在变量, 围绕环境改善与主客互动或邻里和睦引致居民高幸福感。其中 M4 辅以~经济获益感知、~社区参与和~自我发展获得等 3 种条件组合中最高覆盖度, 表明低经济获益与自我发展感知且低社区参与, 即基本不直接参与旅游相关活动, 仅从环境获益感知与主客情感团结层面获益的居民更可能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较高幸福感, 在关系要素重要性再次得到证实的同时, 也显现出除人-地关系直接作用、获取经济效益提升幸福感外, 存在着另一种以良好人-人关系引导, 发挥环境与情感共同作用的溢出效应来带动居民广泛提升幸福感的途径可能性。

涉及关键要素最多的为“经济-环境-关系型”, 包含 M6 与 M7 这 2 种条件组合。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三大主要变量同时发挥作用, 表现出人-地与人-人关系系统同时发挥作用引致的居民高幸福感, 而这一类型所覆盖的条件组合 M6 也表现出最高的唯一覆盖度, 说明当人-地与人-人关系系统同时作用时对居民高幸福感的产生具有最高的解释力。以上 4 种类型都不能完全依靠某一种变量直接引致幸福感, 在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与组合的过程中再度体现出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复杂性。

3 结论与讨论

立足于人地关系视角, 本文构建了涉及人-地、人-人关系的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框架,

探究在人地密切关联的复杂巨系统中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客观物质环境与主观社会关系等多重因素对目的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

1) PLS-SEM 分析结果表明, 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自我发展等 4 大变量均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情感团结表现出最高的路径系数, 而经济获益感知与社区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必要条件分析表明, 依靠单个变量无法得到居民高幸福感的预期结果, 需将多个变量组合分析居民高幸福感这一多重复杂并发因果的作用路径。

2) 多个变量的条件组合可以解释居民高幸福感这一多重复杂并发因果的作用路径。通过 fsQCA 分析得到 7 种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超过 0.20, 总体一致性大于 0.75, 均超过研究设定的阈值标准, 均能构成引致居民高幸福感的组合路径。条件组合中涉及主客关系的情感团结变量出现频次达到最高的 6 次, 在引致居民高幸福感的路径中发挥核心作用, 与以往研究中社会互动与紧密联系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促进作用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环境获益感知与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也是条件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验证了旅游的环境、社会影响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两大变量间依赖最为明显, 同时经济获益感知呈现双向表现, 低或高经济获益感知与其他变量组合均可能形成引致高幸福感的组合路径; 社区参与变量在条件组合中表现并不突出, 不同于已有研究认为的社区参与程度越高的居民幸福感水平越高, 这可能与政府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及旅游业在地方经济社会中的嵌入程度有关。

3) 7 种条件组合中存在要素共性, 可归纳出 4 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 分别为纯关系型、经济-关系型、环境-关系型与经济-环境-关系型, 4 种类型的作用路径均体现出旅游情境下人与地方、人际之间相互作用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其中, 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3 种类型要素综合作用的经济-环境-关系型路径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最高的解释力。不同于部分研究认为的环境与设施改善是乡村旅游地居民获得高幸福感的首要条件, 本文发现社会关系在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中居于核心地位, 所有类型作用路径均不能脱离代表社会关系的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其中之一

发挥作用。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在强调集体精神、注重社会关系的中国文化背景下, 人际关系质量在乡村居民幸福感获得中的重要性。最后, 4 种路径类型中, 经济获益感知、环境获益感知与情感团结或社会文化获益感知 3 种类型要素综合作用的经济-环境-关系型路径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最高的解释力。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将代表主客关系因素的情感团结变量纳入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 证实了情感团结与社会文化获益等关系变量在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作用路径中的核心作用; 采用 PLS-SEM、fsQCA 与模式归类相结合的方式对居民幸福感研究, 为验证分析框架有用性以及探究复杂路径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研究方案。研究结论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政策制定提供支持。首先, 经济获益与环境改善依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仍然是政策关注的重要方向。其次, 人-人关系在居民幸福感获得中也发挥着促进作用。政府除了关注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之外, 还应采取措施引导村民邻里关系、居游关系的良性发展, 加强乡村人-人互动的关系网络建设。可以优先扶持具备一定基础的本地及外来能人来夯实旅游发展基础, 吸引游客提升村落活力, 促成乡村旅游发展成果溢出, 辐射到直接参与能力较低的边缘人群, 提升整体居民幸福感, 实现由政府主导向村民主导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针对不同发展背景、处于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案例地,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有待检验; 未来研究还可从社会公平、地方依恋、政府信任等角度进一步完善旅游地居民幸福感路径组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陆林, 李磊, 侯颖. 疫情危机下旅游地韧性与发展[J]. 旅游学刊, 2022, 37(9): 1-3. [Lu Lin, Li Lei, Hou Ying. Resilie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under the epidemic crisis. *Tourism Tribune*, 2022, 37(9): 1-3.]
- [2] 孙九霞, 黄凯洁, 王学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 逻辑与案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3): 39-49. [Sun Jiuxia, Huang Kaijie, Wang Xueji.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local experiences: Logic and cases. *Tourism Tribune*, 2020, 35(3): 39-49.]
- [3] 麻学锋, 刘玉林, 谭佳欣.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12): 2019-2026. [Ma Xuefeng, Liu Yulin, Tan Jiaxin.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en by tourism: Taking Wulingyuan district of Zhangjiajie City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2): 2019-2026.]
- [4] 朱怡帆, 何丹, 程庆, 等. 都市旅游视角下上海市共享住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8): 1321-1331. [Zhu Yifan, He Dan, Cheng Qing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red accommodat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in Shangh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touris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8): 1321-1331.]
- [5] 刘鲁, 吴必虎.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发展: 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J]. 地理科学, 2021, 41(11): 1897-1906. [Liu Lu, Wu Bihu. Rural development about urban-scenic dual-drive village: Path choice and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1): 1897-1906.]
- [6] Seligman M E P. Authentic happiness: 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 [7] 王咏, 陆林.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57-1574. [Wang Yong, Lu Lin. Community tourism suppor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Case studies of gateway communities of Huangshan Scenic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57-1574.]
- [8] Andereck K L, Nyaupane G P.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 among residen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3): 248-260.
- [9] 黄克己, 张朝枝, 吴茂英. 遗产地居民幸福吗? 基于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案例分析[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122-132. [Huang Keji, Zhang Chaozhi, Wu Maoying. Are residents at heritage sites happy?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ro-poor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s.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1): 122-132.]
- [10] Kim K, Uysal M, Sirgy M J. 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3): 527-540.
- [11] Uysal M, Sirgy M J, Woo E et al.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4): 244-261.
- [12] 黄剑锋, 陆林, 宋玉. 微观视角下旅游情境人地关系的理论与经验[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360-2378. [Huang Jianfeng, Lu Lin, Song Yu.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n tourism context from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360-2378.]
- [13] Cheng L, Xu J. Benefit-sharing, and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An asymmetric approach[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2021, 21(5): 100631.
- [14] Su L, Huang S S, Huang J. Effects of destin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ourism impacts 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and

-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2018, 42(7): 1039-1057.
- [15] 郭安禧, 王松茂, 李海军, 等.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研究——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J]. *旅游学刊*, 2020, 35(6): 96-108. [Guo Anxi, Wang Songmao, Li Haijun et 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on suppor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rmediary role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community identity. *Tourism Tribune*, 2020, 35(6): 96-108.]
- [16] Lai H K, Pinto P, Pintassilgo P. Quality of life and emotional solidarity i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ts: The case of Macau[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1, 60(5): 1123-1139.
- [17] 王铭杰, 孟凯, 张世泽, 等. 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 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的要素结构辨识和认知机制解析[J]. *热带地理*, 2021, 41(6): 1325-1337. [Wang Mingjie, Meng Kai, Zhang Shize et al. Rurality and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 Element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analysis based on tourists' perception.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6): 1325-1337.]
- [18] 陈志军, 徐飞雄.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以关中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2): 231-240. [Chen Zhijun, Xu Feixiong.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Guanzhong area as an example.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2): 231-240.]
- [19] 黄震方, 黄睿. 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理学理论透视与学术创新[J]. *地理研究*, 2015, 34(1): 15-26.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based 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15-26.]
- [20] Woosnam K M, Aleshinloye K D. Residents' emotional solidarity with tourists: Explaining perceived impacts of a cultural heritage festival[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2018, 42(4): 587-605.
- [21] Nunkoo R, Ramkissoon H. Developing a community support model for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3): 964-988.
- [22] Woodside A G. Embrace perform-model: Complexity theory, contrarian case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alit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12): 2495-2503.
- [23] 张圆刚, 余向洋. 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因素与路径——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633-1646. [Zhang Yuangang, Yu Xiangyang.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ourists' living space changes: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7): 1633-1646.]
- [24] 李帅. 惠威尔的归纳“综合”: 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J]. *世界哲学*, 2022(3): 142-150. [Li Shuai. Whewell's inductive "synthesis": A double variation on theory and practice. *World Philosophy*, 2022(3): 142-150.]
- [25] 杨立华, 李志刚, 朱利平. 环境抗争引发政策议程设置: 组合路径、模式归纳与耦合机制——基于36起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6): 86-96. [Yang Lihua, Li Zhigang, Zhu Liping. Combined paths, schema induction, and coupling mechanism of policy agenda setting triggered by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Based on 36 cases through fsQCA.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2021(6): 86-96.]
- [26] 王洛忠, 孙泉坤, 陈宇. 组态视角下我国邻避冲突产生模式概化——基于3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J]. *城市问题*, 2020(6): 47-55. [Wang Luozhong, Sun Xiaokun, Chen Yu. An overview of the patterns of conflict avoidance in China from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30 cases. *Urban Problems*, 2020(6): 47-55.]
- [27] Olya H, Jung T H, Dieck M et al. Engaging visitors of science festivals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Asymmetrical modell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0, 32(2): 769-796.
- [28] 伯努瓦·里豪克斯, 查尔斯·C·拉金. QCA设计原理与应用: 超越定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 杜运周, 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Rihoux B, Ragin C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Translated by Du Yunzhou et al.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9.]
- [29] Rasoolimanesh S M, Ringle C M, Sarstedt M et al. The combined use of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approaches: Partial least square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1, 33(5): 1571-1592.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Zhu Yifan^{1,2}, He Dan^{1,3}, Fan Zhenjie³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affects many aspects of rural residents' daily life and is related to their well-be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spillover theory is used to explain the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bo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emotional conditions are being focused on. With the combined use of PLS-SEM and fsQC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combination of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based on testing the net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xplores the types of paths that lead to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ourism in improving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laim that: 1) Emotional solidarity, environmental benefit percep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 percep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However, the simple antecedent variables do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redicting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that depends on the conditions combined with other elements. 2) Seven condition combinations have high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The dependence between self-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benefit perception is the most obvious. Economic benefit perception shows two-way performance in the condition combin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not outstanding in the condition combina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ditions, four types of paths leading to residents' high well-being can be summarized,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elements represented by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benefits play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is study further confirms the complexit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differential policies for formulating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residents'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well-being;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PLS-SEM; fsQCA